



台传媒记者 陈国炎 吴世渊 文

# 两把日机座椅，一段抗战记忆



▲浦江中学内的金平欧半身铜像

85年前，一位天台人去过浦江担任县长，时值抗战，他与这座城市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

在浦江的4年零5个月里，他创办县立战时补习学校、县立卫生院、军属自生工厂，推行战时政治教育，呼吁民众抗日。

离任之际，继任者送他两把椅子，拆解自一架日军轰炸机，是浦江人民英勇抗战的象征。他很珍视这两件战利品，将它们带到了天台老家。

他叫金平欧，是民国时期，浦江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县长。

斗转星移，8月14日，金家后人将这两把椅子，从天台又送往浦江，捐赠给了浦江档案馆。在“侵华罪证——坠浦日机飞行员座椅捐赠仪式”现场，浦江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党组成员陈鹏进为他们颁发了收藏证书。两件文物，将收藏于馆内的浦江红色主题展厅。

“86年前的今天，一架日本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坠毁在浦江朱宅的一处山坳中，多年来，金氏家族三代人用心守护，完整保存了当年坠机的这两把飞行员座椅，并将它们无偿捐赠给浦江档案馆，这个意义非同寻常，对金华来说，这是至今唯一保存下来的侵华日军飞机残骸。”陈鹏进说。

归去来兮，两把椅子，牵出一段抗战记忆。



▲8月14日，在“侵华罪证——坠浦日机飞行员座椅捐赠仪式”现场。从右到左，分别为金家后人金树立、朱雪龙，浦江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党组成员陈鹏进，浦江档案馆馆长张伟文。

朱雪龙女士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金全才的夫人，现年76岁。两年前，她翻修天台县后洋陈巷3号的金家老宅时，发现了阁楼里的两把日椅子。

这是两把奇特的椅子。上半部分由铝制成，椅身

接合处，有整齐细密的铆钉，显然是工业制品。下半部分是木质的三脚底座，像是手工削制而成。人坐在上面，椅身可以旋转。因年岁久远，金属面已锈迹斑斑。朱雪龙记得，多年以前，她嫁到金家没多久时，就曾看到过这两把椅子。她好奇地问婆婆：这椅子是哪来的？

婆婆说，这是你们爸爸从浦江带来的。

婆婆名叫张振亚，原名张本，原浙江省立第六中学（今台州中学）校长张忻之女，国立武昌中山大学（今武汉大学）法律系毕业，新中国成立之前，是一名律师。

张振亚口中的“你们爸爸”，就是她的丈夫金平欧。1938年9月至1943年4月，在浦江担任县长。

1949年11月，金平欧去了台湾，张振亚留在天台，夫妻二人余生再未见面。这两把椅子，放在一间藏书的小阁楼中。

196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初，一群人冲进了金宅，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。藏书阁里头的书卷、物件，都被丢到露天场地，付之一炬。

两把椅子也被翻了出来，领头的人指着问，这是做什么用的？张振亚回答，是剃头椅。领头的摆弄了一番，发现椅子能旋转，确实像剃头椅一般，便不再追究。这场浩劫中，两把椅子“幸存”下来。

椅子当然不是剃头用的。见儿媳问起，张振亚说，抗战时期，一架日本飞机掉到浦江境内。两把椅子，是飞机上的飞行员座椅，拆下来后，安上木头底座，成了县政府的办公用品。“后来，你们爸爸辞去了县长职务，下一任县长就把椅子送给他。”

时过境迁，当年的新婚夫妇，如今已年逾古稀。老伴金全才，也于2015年去世。当椅子再次出现在眼前时，朱雪龙意识到这是两件珍贵的文物。她旋即与儿子金树立商量：“要将这两把椅子，送回事件的发生地——浦江。”

金树立从未见过爷爷金平欧。1970年，他出生那年，爷爷从台湾辗转香港寄来一封信，说男孩起名“树立”，取自王安石“男儿少壮不树立，携此穷老老安归”。名字里，有殷殷期盼，亦有谆谆教诲。

一年后，爷爷在台湾病逝，享年68岁。由于通信不便，天台的家人过了许久，才得知这一消息。

关于“爷爷”，年幼的金树立只能通过老照片，以及奶奶口中的只字片语，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背影。别说他了，就连他父亲金全才，对自己的父亲也不十分熟悉。毕竟爷爷远赴台湾时，父亲才9岁。

直到一位浦江文学学者的造访，才让爷爷，或者说金平欧的形象，在他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。这位学者，是浦江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张解民。

张解民是研究浦江近现代史的专家，著有《浦江百年人物》（2002）。2008年，他开始编纂《回望抗战——浦江战时实录》一书。在查阅浦江档案馆内3361册民国档案、采访抗战亲历者过程中，他发现“金平欧”这一名字，与浦江抗战历史密不可分。

“民国时期，浦江有28位民事长、知事、县长，其中以金平欧任期最长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，他所表现出的台州式硬气、知识分子的气节，着实令人敬佩。”张解民说。

于是，他多方找寻，终于联系上了天台的金全才一家。双方聚在一起，互通信息有无，将金平欧的一生串连起来。

金平欧，原名金梁汗，清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生，天台城关人。他出生于教育世家，祖父金文田，是晚清进士，天台中学堂（今天台中学）的创始人；父亲金衡峰，廪生出身，由清政府公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，历任福建仙游、永泰两县知县。

1924年，金平欧从南洋路矿学校土木工程科毕业，到詹天佑的工程队里做设计师。没干多久，工程队就因资金短缺，就地解散，工资一分钱没有，只发给他一套西服。

失业后的金平欧，到武汉一家民办报纸当记者，写文章揭露官员的贪腐行径，被迫离职。他回到天台文明小学当教员，在一场政治风波中，受人诬告，与校长许杰（文学家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）一同被关押了一个多月。

1927年，金平欧与张振亚结婚，两人打小认识，金张两家亦有婚约。同年，金平欧考上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，次年毕业，是该校的第一期学生。

1935年5月，金平欧任浙江省武义县县长；1938年9月，调任浦江县长，时年35岁。

“我的爷爷在浦江时，办了一所中学，这是他担任县长期间，最为人所称道的事。”金树立说。

彼时，浦江无中学。有条件的家庭，都送孩子去沪杭甬读书，或在就近的省立中学深造。

1937年7月，抗战全面爆发，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相继陷落，许多在外的学子回乡避难。县里无学可上，青少年只好辍学在家。

兴许是受祖辈影响，抑或自己当过教员，金平欧对县内青少年的教育甚为关切，甫一上任，即决议筹办学校。他通过县抗日自卫会成立筹备会，募集资金，勘察合适的地点。不久，就确定以蒲阳镇城南白佛寺赵氏宗祠、孔庙为校址，对建筑加以修缮和添筑。

1938年10月4日，《浦江日报》刊登消息，“失学青年救星——县政府筹办战时初中补习班”，轰动全县。

10月28日，战时初中补习学校招生计划正式公布。学校计划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100名，男女兼收。报名时间定于1939年1月5日至19日，报名地点设在浦江县政府教育科，考试地点设在县立蒲阳小学内，考试科目分国语、算术、常识（社会自然）三门。报名那日，应试者近600人，其中不光有浦江县内的青少年，一些邻县的学子也闻讯赶来。

1939年2月1日，浦江历史上第一所由政府设立的中等学校——县立战时初中补习学校（以下简称“战中”）正式开学。金平欧兼任该校的校长，聘任了十余名教职人员。该年两度招生，第一学期在校生有245人。

为了适应抗日救亡需要，“战中”师生除了日常上课，每周还定期举行歌咏、募捐、兵役等宣传活动。自开学以来，至是年10月，师生们募捐救国金86.8元。慰问抗战出征军人家属，由“战中”学子组成的童子军，

协助县教育科举行识字活动、演唱抗日进步歌曲等，《黄河大合唱》《红缨枪》等歌声响彻浦江城乡。

1940年2月，金平欧辞去“战中”校长职务，由张源（河北武清人，中央政治大学毕业）接替。

后来，“战中”数易其名，至1956年11月，改名浙江省浦江中学。该校以“为邑树人”“作育英才”“文武通达”为宗旨，弦诵相闻，蔚成风尚。校园内，立着金平欧的半身铜像，上书“首任校长”。日前，我们跟随金家后人到校园寻访，见铜像旁植一棵石榴树，枝头硕果累累。

四

任职县长期间，除了创办“战中”，金平欧还筹设卫生院（1939年11月），创建出征抗敌人家属自生工厂等，这些都是浦江近现代最早的县立医院和工厂。

在《三年来之浦江县政府》一文中，金平欧写到，浦江“民间风气相当强悍，严而公则易治，宽而和则难治。其人怀德畏威，则未尝不可治也”。

当时浦江县赌风盛行，为了整顿陋习，金平欧下令全城禁赌，抓到有赌博者，军棍拷打之。一时间，社会风气改良许多。

战争年代，日军除了军事侵犯，亦有“政治进攻”的种种引诱、煽动与扰乱。为此，金平欧首创了浦江县政情展览会，以推行战时政治教育。

1940年12月25日，县政情展览会在蒲阳镇中心学校举办。展览分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教育文化、特种陈列室五部分，共计展品1575件。展会举行了2天，有34000余民众观展，盛况空前。

通过政情展览，民众对政府推行政令有了更深刻的了解，如政府为何要实施粮食管制、为何要实行经济封锁、为何要禁售敌货等等。

1942年5月，日军大举南侵，浦江县城三度沦陷。日军烧杀抢掠，犯下无数反人类暴行。个中史料，至今翻来，不忍卒看。

由于敌我力量悬殊，县政府只好迁移。金平欧迂回多地，在距离大畈西北9公里的黄家村（今浦江大畈乡黄丰村）落脚为县政府机关临时办公驻地。



▲浦江县政府机关临时办公驻地旧址

沦陷后的浦江，县城被日伪政府所占，原县政府部分科长竟选择为日伪工作。危险、诱惑，笼罩在小小的县城上空。“从当下的视角看，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，金平欧依然固守于县内，作为‘父母官’，他没有叛逃，有始有终。”张解民说。

1943年4月，金平欧辞去县长职务。离别之际，后一任县长魏思统送给他两把椅子，以作纪念——就是上文所述的那两把。

此后，金平欧一直在国民党中央任职；1949年去了台湾，在“交通部”工作。

一湾海峡，阻挡了回家的路，孑然一身的金平欧，只能以书信跟妻儿联络，有时，他会向老家寄一些药品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他研究政治学，著有《三民主义与各种学术》（1968）、《国父哲学思想》（1969）。1971年去世后，葬在台北交通大学附近的公墓。

五

“回家”，是在2013年。金全才与女儿金晓立前往台湾，将金平欧的骨灰带回天台，与张振亚合葬。

而金平欧的遗物——两把日军飞机座椅，10年后也回到了浦江。它们的到来，为浦江抗战史提供了有力实证。

这架日军飞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它为什么会掉落浦江？

故事要从日军一场失败的空袭说起。1937年8月14日，中日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，下午2点50分，日军鹿屋及木更津航空队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，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。他们分成两队，一队空袭杭州笕桥机场，一队空袭安徽广德机场，目的是破坏摧毁中国空军力量和机场设备。

傍晚6时许，9架日军飞机飞抵笕桥机场，展开轰炸，由于受当时台风天气影响，天空乌云密布，能见度低，轰炸的准确率并不高。

时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临危不惧，驾驶霍克-3战斗机腾空迎敌，从云层上摸索到云层下，占据有利位置，瞄准敌机开火。一阵短暂而激烈的空战，高志航等人共击落日机3架。我方则无一伤亡，这是中国空军抗日首次空战的胜利。

与此同时，日军飞往广德的空袭队中，有一架敌机因迷失方向，坠落浦江北宅（今浦江北宅乡新光村）附近的山间。

傍晚6时许，一阵突如其来巨响，惊动了宁静的村庄。村民们抬头望向天空，只见一朵“云彩”缓缓飘下，落在了村边田地上。大伙蜂拥而至，原来是一个跳伞的日军飞行员，系着安全带，坐在一把座椅上。他着地后几分钟一动不动，可能是受到了惊吓，或四肢麻木难以动弹。

有一位村民见到日本兵，怒火中烧，举起锄头想锄死对方，但被多数围观村民拦了下来。大伙将日本兵押解到村庄，先置于保长朱宝书家中，晚上又将其关到治敌堂，安排村民看管，并将此事上报县政府。

飞机的坠毁地点，在一处名叫木佛尚的山谷，离村约有三四里路。许多村民赶去看个究竟，发现飞机残骸已散落一地，飞机主架在燃烧，还有6具尸体。

浦江抗日自卫队独立中队队长洪邦基与县警察局的警察，去木佛尚实地察看，寻找了一些飞机铁，又雇民夫把飞机残骸挑到县政府。

日军飞行员俘虏，则被押解到县城，自上大街至下大街沿街示众。这个俘虏名叫恩地五郎，后递解至浙江省第四区专署（驻地兰溪）。据时任浙江省第四区行政专员阮毅成事后回忆，恩地五郎是淞沪会战开始



▲侵华日机坠落浦江事件目击者朱耀相

后第一名日本空军俘虏。

这起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坠毁事件，无疑是浦江乃至浙江省抗战史上的大事。我们很好奇，在事件发生时，是否还有当年的亲历者。

8月13日傍晚，我们来到浦江朱宅乡智丰村。幸运的是，在村干部的带领下，找到一位94岁的老人朱耀相，他是当年侵华日机坠毁事件的目击者。

老人家正在村养老中心吃晚饭，见我们来，收拾好碗筷，走到门堂前，正襟危坐。他穿一件深蓝色衬衫，双目有神，说起86年前的往事，一口浦江方言滔滔不绝，仿佛发生在昨日。

那年朱耀相8岁，飞机掉落那天，下着雨，他在村口的溪滩头玩耍。忽然一声爆裂的巨响，他吓得双脚从台阶上跌进了溪水里。抬头看去，一架燃烧的飞机冒着黑烟，从远山掠将过来，往村西北面飞去。接着又一声巨响，应是飞机坠毁声。

此时，天空有个“小白点”飘荡，慢慢变大，他看清楚了，是一个飞行员戴着降落伞。后来，村民把飞行员抓了起来，关在了厅堂。那一声爆炸后，许多金属残骸从天空落下，掉在村民房屋顶。

“我跟着村民，跑到坠机地看热闹，大家都在收拾铁片，我年纪小，没有上去捡。”朱耀相说。

浦江朱宅乡新光村村委会原主任朱玉堂也聊起了他父亲的一段经历：“我父亲叫朱祖南，1908年生，飞机掉下来那天，他与其他三位村民跑到现场，将飞机尾巴抬起来，摆在治敌堂。后来，这些飞机残骸全交给了政府。”

往事已矣。当年的日机残骸，大多湮没于历史的尘埃。两把日机座椅，却在离浦江百余公里外的天台重见天日。人证、物证俱在，日军侵华的罪行，铁证如山！

六

两把日机座椅，见证了天台金氏的家史，见证了浦江县的抗战史，也见证了中华民族面对强敌入侵时，浴血奋战的家国史。两件文物也如同桥梁，连结起台州、金华两地的文史记忆。

无独有偶，抗战期间，也曾有架日军飞机掉落台州。1945年3月17日，日军“晴空”号水上飞机落在椒江霞浦老道头（老码头）附近，机上的日本海军第四南遣舰队司令长官、海军中将山县正亲丧命当场。如今，这架飞机的主体残骸，仍深埋在椒江沿岸滩涂9米以下的淤泥中。

14年抗日战争，有多少侵华罪证，遗留在中华大地？又有多少志士坚决与日军抗战到底？

折戟沉沙铁未销。这些“折戟”时时提醒着我们——勿忘历史，吾辈自强。

谨以此文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。

参考资料：《回望抗战——浦江战时实录》/张解民

图片由台传媒记者林慧、吴世渊拍摄  
感谢金树立、张解民先生提供部分老照片



▲在浦江任县长时的金平欧



▲金平欧、张振亚夫妇